

论樊鹏对前七子诗学理论的继承与变异^{*}

史小军, 张佩琳

(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兴起于明弘治、正德年间, 其力倡复古, 于其时形成一股声势浩大且影响深远的复古潮流。樊鹏师承何景明, 于承继前七子复古理论的同时, 对前七子在理论建构与创作实践中所呈现之流弊有所思考、匡正, 遂于因袭之中别开新面: 继承前七子的复古意识, 又针对其偏狭之失, 把拟古对象由盛唐扩张至初唐; 沿袭前七子的辨体意识, 论诗主情真, 但更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 强调诗教以及倡“文以载道”; 前期受前七子影响而持“宗杜”意识, 后期在何景明的启迪下倡杜诗“变体”说。

【关键词】樊鹏; 前七子; 诗学思想; 继承与变异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25)04-0123-10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5.04.014

樊鹏, 字少南, 号南溟, 河南汝宁府信阳州(今河南省信阳市)人, 嘉靖五年(1526)举进士第, 历任直隶保定府安州知州、南京户部浙江司员外、南京工部营缮司郎中, 有诗文集《樊氏集》。樊鹏游于何景明、康海之门, 与戴冠、孟洋、唐顺之等为诗文友, 是前七子羽翼队伍中的重要一员。^①整体而言, 樊鹏的诗学思想与前七子基本相同, 但独特的个性气质以及所处时代、文坛状况的不同使其诗学思想在继承前七子复古意识的基础上又有所衍变、创新, 呈现出鲜明的融合与分化特征。

目前学界关于樊鹏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缺乏对樊鹏的专门研究, 有部分学者的专著或单篇论文中提及樊鹏的诗学思想, 主要聚焦于以下两点: 其一, 认为樊鹏受何景明诗学思想的影响, 倡导初唐诗, 持杜诗“变体”说。^②其二, 将樊鹏纳入活跃于嘉靖初年的初唐诗派的谱系中。^③显然, 学界对樊鹏继承何景明诗学思想这一点已有所关注, 甚至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樊鹏是明代复古运动内部变化的典型例子,^④但还没有对樊鹏的诗学思想做系统观照。樊鹏广泛吸纳前七子、嘉靖年间各流派的学说, 其诗学思想不仅仅是对何景明诗学观的简单继承。因此, 本文拟从整体性视角出发, 梳理樊鹏的诗学体系及其与前七子的

^{*} 【作者简介】史小军, 男, 陕西岐山人, 暨南大学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 张佩琳, 女, 广东江门人, 暨南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前后七子羽翼研究”(20BZW094)。

① 史小军, 彭彩玲. 明代前后七子羽翼圈层分级考论[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3): 105-114.

② 如黄卓越在《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中提出, 樊鹏是受何景明的影响而倡导初唐诗的, 其他如孙学堂、冯小禄等学者都对樊鹏继承何景明而倡初唐诗这一观点有所揭示。金生奎则指出樊鹏对何景明杜诗“变体”概念的继承。参见: 黄卓越. 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孙学堂. 明代诗学与唐诗[M]. 济南: 齐鲁书社, 2012; 冯小禄. 明代诗文论争研究[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6; 金生奎. 明代杜诗接受研究[M]. 合肥: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③ 王春翔. 嘉靖前期“六朝初唐派”商榷: 兼辨析“为初唐者”[J]. 中国诗歌研究, 2022, (1): 70-83.

④ 如余来明认为樊鹏是“何派”诗人主张弃盛唐取初唐的显著例子, 还指出“樊鹏与李梦阳等人在律诗取法的统系选择方面已有所不同。他的改变, 反映出‘前七子’复古运动式微后追随复古的诗人在诗坛风尚变迁的背景下诗学策略的调整。”郑利华同样指出樊鹏倡初唐诗是受到何景明影响, 但较何景明而言, 樊鹏更专注于初唐诗歌, 而其对初唐诗关注和实践的强度使初唐诗的价值地位被拉升。参见: 余来明. 嘉靖前期诗坛研究(1522~1550)[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郑利华. 明代诗学思想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2.

趋同离合,探究其诗学嬗变之缘由。樊鹏诗学理念之“承”,乃其个人学养与审美理想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其“变”亦未背离前七子复古之轨辙,本质上仍属复古派内部的自我调适与修正。

一、樊鹏对前七子诗学理论的继承

樊鹏在正德初年始求学于何景明,^①受何景明等前七子复古观念影响颇深,继承前七子的复古内容,主张古体宗汉魏;继承前七子的辨体意识,主张诗文有别、古体近体有别;在何景明影响下,接受“杜诗”为变体的说法,并以此作为批评“献吉派”等人的依据。

(一) 复古意识与古体宗汉魏

与前七子一样,樊鹏以恢复古典诗歌审美特征为目的倡言复古,从“第一义”^②的诗学逻辑出发选择取径对象。前七子等人主张古体宗汉魏,如何景明在《汉魏诗集序》中所言:“汉兴,不尚文,而诗有古风……继汉作者,于魏为盛,然其风斯衰矣。晋逮六朝,作者益盛,而风益衰。其志流,其政倾,其俗放,靡靡乎不可止也。唐诗工词,宋诗谈理,虽代有作者,而汉魏之风蔑如也。”^③何氏奉汉魏诗歌为古体创作之圭臬,主张“古作必从汉魏求之”。^④樊鹏在《编初唐诗叙》中有“诗自删后,汉魏古诗为近”^⑤之说,这其实是表明《诗经》是复古的本源,而汉魏古诗是最接近《诗经》的,因此汉魏古诗就成为古体的宗法对象;在《与康对山论诗书》中亦言“以为古诗汉魏尚矣”^⑥,可见樊鹏在尊崇汉魏古诗的诗学取向上与何景明等前七子的复古内容完全契合。

樊鹏复古观念的形成,一方面源于自身好古,另一方面则受到何景明的影响。樊鹏“自幼与先生同里,长而从学”^⑦;何景明曾称赞樊鹏“好读书,慕古昔。从予学,甚解”^⑧,此语不仅揭示了樊鹏勤学好古的品行,更表明其能领悟其师学说,深契何氏诗学之精髓。何景明的行状是由樊鹏写作的,^⑨樊鹏也深深服膺于何景明的理论与创作成就,在为何景明撰写的行状中曾言:

国朝去古益远,诗文至弘治间极矣。先生首与北地李子一变而之古。三代而下,文取诸左、马,诗许曹、刘,赋赏屈、宋,书称颜、柳。天下翕然从风。盛矣,千载一时也!尝曰:“诗文有不易之法,辞断而意属,联类而比物”“殊途百虑而一致同归”“文靡于隋,韩力振之,而古文亡于韩,诗弱于陶,谢力振之,而古诗亡于谢”。繇此观之,先生之所著述可见矣。^⑩

樊鹏友人、同为何景明羽翼的戴冠在《与樊少南》中云:“前言思读好书,此是少南进益处……少南

① 樊鹏在《中顺大夫陕西提学副使何大复先生行状》中自述求学于何景明的经过:“鹏自幼与先生同里,长而从学。先生尝谓梅溪公曰:‘是子甚解,吾有望也。’及后先生官京师六年,至是又五年余。始从事诗文,望先生归一讲焉,及归而竟不起。伤何如耶!”由此可知,樊鹏是在正德元年到正德五年何景明归信阳这几年间向他求学的。参见:何景明. 何大复集 [M]. 李淑毅,点校.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681.

②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言:“禅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明代以来的学者受严羽“第一义”启发,常用以指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和准则。

③ 何景明. 何大复集 [M]. 李淑毅,点校.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593.

④ 何景明在《海叟集序》中言:“故景明学歌行、近体有取于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诸人;而古作必从汉魏求之。”参见:何景明. 何大复集 [M]. 李淑毅,点校.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595.

⑤ 樊鹏. 樊氏集 [M]. 明嘉靖十三年孔天胤刻本. 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⑥ 樊鹏. 樊氏集 [M]. 明嘉靖十三年孔天胤刻本. 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⑦ 樊鹏. 中顺大夫陕西提学副使何大复先生行状 [A]. 何景明. 何大复集 [M]. 李淑毅,点校.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680.

⑧ 何景明. 樊懋昭墓志铭 [A]. 何景明. 何大复集 [M]. 李淑毅,点校.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626.

⑨ 樊鹏在《中顺大夫陕西提学副使何大复先生行状》中言:“兄景晖谓鹏曰:‘亡弟素爱子,子状之。’”参见:何景明. 何大复集 [M]. 李淑毅,点校.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681.

⑩ 樊鹏. 中顺大夫陕西提学副使何大复先生行状 [A]. 何景明. 何大复集 [M]. 李淑毅,点校.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681.

又言必春秋战国之集,古书春秋战国者甚不易得,且多伪者,不可不择。然惟少南天资敏迈,迥出流辈者可以语此耳!”^①这段文字当系樊鹏来函表达自己欲读春秋战国之集的想法,戴冠对此作出回应,其中既肯定其研读古籍的治学取向,又对其过分崇古的倾向予以委婉规劝。两则材料相互印证,体现了樊鹏崇古尚雅的学术个性。

作为何景明门人,樊鹏在创作上以古为尚,致力摹拟“第一义”之作,理论上也倡言复古,因此在当时即被明确列入复古阵营。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明言:

“我朝文章,在弘治正德间可谓极盛,李空同、何大复、康海、边华泉、徐昌谷一时共相推轂,倡复古道。而南京王南原、顾东桥,宝应朱凌溪则其流亚也,然诸人犹以吴音少之。稍后则有亳州薛西原(蕙)、祥符高子业(叔嗣)、广西戴时亮(钦)、沁水常明卿(伦)、河南左中川(国玠)、关中马西玄(汝驥)诸人。薛西原规模大复……他如王庸之(教)、李川甫(濂),则空同门人;樊少南(鹏)、戴仲鹖(冠)、孟望之(洋),则大复门人。”^②

何良俊此论也明确表明了樊鹏在复古运动中的羽翼身份,与我们将其作为前七子羽翼的判断是一致的。

(二) 辨体意识与诗主情真

明人注重辨体,诗学辨体内容亦极为复杂。樊鹏对前七子辨体观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古诗与律诗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诗体;二是主张诗文有别,诗主情真,文以载道。

首先是诗歌内部的辨体。前七子复古的口号便是“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③,可见在诗歌上前七子主张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宗法对象的不同体现出前七子辨体意识之严明。何景明在《海叟集序》中明确表述:“然(李、杜)二家歌行近体,诚有可法;而古作尚有离去者,犹未尽可法之也。故景明学歌行、近体有取于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诸人;而古作必从汉魏求之。”^④这种鲜明的辨体意识深刻影响了樊鹏的诗学观念,因此在《编初唐诗叙》中有“至初唐,无古诗而律诗兴”之说,胡应麟以为此说为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⑤一论之本,“观此,则李于麟前,唐古已有斯论”^⑥。试审看樊氏原文:

诗自删后,汉魏古诗为近。汉魏后六朝滋盛,然风斯靡矣。至初唐,无古诗而律诗兴;律诗兴,古诗势不得不废。^⑦

樊鹏对唐初诗坛状况作了简单概述,虽然“唐无古诗”的绝对化说法略显偏颇,但初唐实为古近体诗混杂的时期,因此他说“初唐无古诗”亦可以为人所接受。此论的核心价值在于:一是他把初唐诗置于整体诗史中加以观照,敏锐地把握了初唐诗坛古近体兴替的文学史实,揭示了诗体演进的内在规律;二是将古体、律诗截然分辨的行为体现出其辨体观,而这正是对前七子派辨体意识的继承。

其次是诗文之别,而辨诗文又以其体性为持论依据。前七子于诗文体性之辨持论甚严,这源于严羽《沧浪诗话》,目的还在于恢复古典诗歌审美特征。前七子派深诋宋儒以性理入诗之弊,李梦阳《缶音序》就讥宋人“主理不主调”“薄风云月露”^⑧的诗作,对其时盛行的性气诗更致不满,标举真情为诗道之本。他们认为,诗歌主要是吟咏性情,而文章则是表达道德品行,二者畛域判然。何景明在《内篇二十五》中言:“夫诗之道,尚情而有爱;文之道,尚事而有理。是故召和感情者,诗之道也,慈惠出焉;经德纬

① 戴冠. 戴氏集 [A].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六三 [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94-95.

② 何良俊. 四友斋丛说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235.

③ 王九思. 溪陂续集 [A]. 陕西古代文献集成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7: 316-317.

④ 何景明. 何大复集 [M]. 李淑毅, 点校.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 595.

⑤ 李攀龙. 沧溟先生集 [M]. 包敬第, 标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377.

⑥ 胡应麟. 诗薮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8: 194.

⑦ 樊鹏. 樊氏集 [M]. 明嘉靖十三年孔天胤刻本. 北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⑧ 李梦阳. 李梦阳集校笺 [M]. 郝润华, 校笺.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 1694.

事者,文之道也,礼义出焉。”^①即认为诗道在情,文道在事理,而又根植于道德礼义;李梦阳《缶音序》中所谓“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邪?”^②也表现其严分诗文之体的态度。要之,于诗文之辨,前七子主张诗以言情、文以载道。

樊鹏同样认为诗文有别,重诗道性情之本与文以载道之旨。其言诗称“无涕罔能动物”^③,强调诗歌必本乎诗人之真情,才能动人。同时他又倡言“文以载道”,其《杜研罔集序》彰显出其鲜明的宗经意识:

自端木悟道,发论孔门,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后世剽窃枝干,遂岐文道为二。吁!道匪文,将奚寓六经是矣。学者罔能因是而诣诸室,端木之论岂诬我者!^④

这段话表现出他不满足于割裂文道的行为,力主“文以载道”说。樊鹏认为,文学应当承载和传达“道”,“道”虽非等同于“文”,然必藉“文”以显,“六经”即为典范。他称赞杜柌的文章文道兼修:“极绮丽于言词,收英华于载籍,兼会古人,终于自得。至其慷慨忠烈溢于篇章,实得风雅不传之趋,与子美相望。”^⑤正表明其重文辞也重道义的文学观。但是,二者相较,他更看重“道”——即儒家伦理纲常与经世致用之实学,故其慨叹:“世有称研罔子文章之士,嗟乎浅矣!”^⑥他认为杜柌文章中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内蕴的“道”而非其文辞。

(三) 杜诗“变体”说

前七子主张古体学汉魏,近体学盛唐,尤以杜诗为宗,樊鹏早期创作亦遵循此道,致力于对杜诗格调体制的摹拟。然而,他后期却转而提出杜诗“变体”说,这是不是表明樊鹏从“宗杜”转向“抑杜”呢?是否因背离前七子的复古对象而构成对前七子诗学体系的突破呢?细究之,此说实为对何景明杜诗“变体”理论的承继。七子派内部本就存在理论论争与分化,呈现出相当复杂的状况,^⑦樊鹏称杜诗为“变体”的这一论断正来自何景明。因此,这一观点并非对前七子复古宗旨的背离,反而彰显出流派内部理论发展的延续性与丰富性。

樊鹏前期受业于何景明,把恢复汉魏盛唐诗的高格朗调作为终极目标,而实现的主要途径就是“宗杜”。戴冠在《与樊少南》中言:“高作以杜陵家法,而兼之以晋宋风度,尽之矣。君城居人,乃能为山林语,山之人或由之而不知焉,以境会意,此仆之所以不自知其非已出也。大复后,此等制作甚少,君乃从容渠瓊,或先焉,或后焉,大复为不没矣。”^⑧所谓“家法”与“风度”分别指涉形式和风格两方面,由于戴冠卒于嘉靖八年,所以可以确定,樊鹏嘉靖八年以前的诗歌创作在体式格调上主要是学习杜甫。

“变体”这一概念是由何景明提出并使其最终成为一个杜诗批评概念的,樊鹏在何氏之后重申杜诗“变体”说,其意正在于廓清习杜者一味重视形式摹拟之弊。何景明在《明月篇序》中云:“仆始读杜子七言诗歌,爱其陈事切实,布辞沉着。鄙心窃效之,以为长篇圣于子美矣。既而,读汉魏以来歌诗及唐

① 何景明. 何大复集 [M]. 李淑毅,点校.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551.

② 李梦阳. 李梦阳集校笺 [M]. 郝润华,校笺. 北京:中华书局,2020:1694-1695.

③ 樊鹏. 吕泾野先生四言诗叙 [A]. 樊鹏. 樊氏集 [M]. 明嘉靖十三年孔天胤刻本. 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④ 樊鹏. 樊氏集 [M]. 明嘉靖十三年孔天胤刻本. 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⑤ 樊鹏. 杜研罔集序 [A]. 樊鹏. 樊氏集 [M]. 明嘉靖十三年孔天胤刻本. 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⑥ 樊鹏. 杜研罔集序 [A]. 樊鹏. 樊氏集 [M]. 明嘉靖十三年孔天胤刻本. 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⑦ 在前七子内部就有李梦阳、何景明之间的论争,李梦阳与徐祯卿之间的论争。前七子以外的羽翼因师承的不同又进一步显出差异与分化。如“献吉派”大多仍以汉魏盛唐为宗,旁参六朝、初唐;而“仲默派”则较通脱,视野转向初唐。

⑧ 戴冠. 戴氏集 [A].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M]. 济南:齐鲁书社,1997:95-96.

初四子者之所为,而反复之,则知汉魏固承《三百篇》之后,流风犹可征焉。而四子者虽工富丽,去古远甚,至其音节,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辞固沉着,而调失流转;虽成一家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①杨慎曾言:“何仲默枕藉杜诗,不观余家,其于六朝初唐未数数然也。与予及薛君采言及六朝初唐,始恍然自失,乃作《明月》、《流萤》二篇拟之。”^②杨慎所描绘的何景明由“枕藉杜诗”到“恍然自失”,与何景明自述的始以为“长篇圣于子美”,到心悦汉魏初唐的转向过程是一致的。不过,何景明并没有因此而否定杜诗,他先是肯定了杜诗“成一家语”,继而提出杜诗实为“变体”。樊鹏继承何景明的这一理路,面对嘉靖初年前七子派核心成员离散,羽翼影响力式微、诗坛地位不高而各流派学说又纷纷分门立户的现实情况,为反对拟杜之风而再次重申杜诗“变体”说:

近日名家冠绝海内,自许古人之上,今窃论之,有或失之粗,亦或失之易。失之粗者,稜角峭崛而乏温柔敦厚之旨,失之易者,流丽光泽而少含蓄浑成之趣。所以然者,何也?孜孜于杜,未尝引而上之也。夫杜亦诗之变体,析中于古风,斯为下,且以杜而为沈宋燕许,夫岂不易。但杜欲为宗工巨匠,自成一家,故旷前人而为之调,今人专守,绝墨不离尺寸,不法乎上,苟就于中,夫取法于上,仅得乎中,况取法于中哉!^③

樊鹏所指摘的“失之粗”的“近日名家”当指追摹杜诗变体的李梦阳等人。这一批评其实是他在李、何之争后所作出的诗学选择,樊鹏坚守何景明诗学立场,并以“变体”这一概念作为批评拟杜者的依据。李梦阳“作诗必须学杜”^④,专注于“刻意古范,铸形宿模”^⑤,李梦阳的目的并非在于模仿,他是“强调先求其同而后求其异,因为同是异的基础,异中自然不能无同”^⑥。但“求同”就意味着必须从摹拟入手,如此的后果就是自我个性与时代精神的失落以及诗歌美感核心的缺失。何景明批评李梦阳近作“间入于宋”“辞艰者意反近,意苦者辞反常,色淡黯而中理披慢,读之若摇鞞铎耳”,^⑦指斥其“江西以后诗作”沾染了宋诗的疏卤之气,有违格古调逸、高格朗调之初衷,主要就是因为李梦阳等人只学习了杜诗中开宋调的一端,而没有博采众家。洎李梦阳之后,“献吉派”诸子如熊卓、郑善夫辈更专意规模杜诗变体,胡应麟《诗薮》评其七言“遂无一篇平整”^⑧,此即樊鹏所讥“失之粗”而“稜角峭崛而乏温柔敦厚之旨”者。樊鹏认为,他们创作之失的根源在于固守宗法对象。杜甫作为集大成者,向杜诗学习本没有错。但“孜孜于杜”却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杜诗属于“变体”,不去学“源”而学“变”,不“引而上之”而“苟就于中”,在他看来就是非正统的学诗之路;二是杜甫本身就“自成一家”,所以其调与前人不同,但今人若专守杜诗,就无法再复原他们心目中的高古之格了。另外,何景明在《明月篇序》中有“此其(杜)调反在四子之下与?”^⑨之疑,而樊鹏在此即作出“自成一家,故旷前人而为之调”之答,认为杜诗之所以“调”不同于前人,在于其功力深厚,自成一家。这表明樊鹏没有对杜诗持否定态度,而是高度认可杜诗的艺术成就,他所批评指摘的是那些盲目拟杜之人。

综上可见,在李、何均谢世数年的嘉靖十二年,樊鹏仍继承何景明的杜诗“变体”说以针砭“献吉

① 何景明. 何大复集 [M]. 李淑毅,点校.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210.

② 杨慎. 升庵诗话 [A]. 历代诗话续编:中册 [M]. 北京:中华书局,1983:902.

③ 樊鹏. 与康对山论诗书 [A]. 樊鹏. 樊氏集 [M]. 明嘉靖十三年孔天胤刻本. 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④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引顾璘语,谓李梦阳“作诗必须学杜。诗至杜子美,如至圆不能加规,至方不能加矩矣。”参见:何良俊. 四友斋丛说 [M]. 北京:中华书局,1959:234.

⑤ 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言:“追昔为诗,空同子刻意古范,铸形宿模,而独守尺寸。”参见:何景明. 何大复集 [M]. 李淑毅,点校.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575.

⑥ 史小军.“偏狭”: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的致命伤 [J]. 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2):68-72.

⑦ 何景明. 与李空同论诗书 [A]. 何景明. 何大复集 [M]. 李淑毅,点校.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575.

⑧ 胡应麟. 诗薮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93.

⑨ 何景明. 何大复集 [M]. 李淑毅,点校.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211.

派”摹拟杜诗之弊,可见摹拟杜诗风气流衍之广与持续之久,也可见樊鹏对何景明诗学立场的坚守。

二、樊鹏对前七子诗学理论的变异

樊鹏虽以前七子复古理念为宗,然并非亦步亦趋、墨守成规。其诗学理论的形成既来自前七子复古理论的影响,奠定了他复古的主基调;又受何景明晚年诗学思想转变的影响,同时博采嘉靖初年涌现的诸多流派之新声别调,出于对前七子派近体宗盛唐甚至专守杜诗的不满而把拟古对象拓展至初唐。

(一) 近体由宗法盛唐到学为初唐

樊鹏在恢复古典诗歌审美特征理想下,以复古之文为要义,循着前七子的师古路径,在“取法乎上”的诗学逻辑和严明的辨体观念支配下主张古体应以汉魏为宗。然而,在律体的学习对象上,不同于前七子的以盛唐为尚,樊鹏提出须“引而上之”,主张律体宗初唐,这就突破了前七子固守盛唐之藩篱。

樊鹏致力于通过阐述初唐诗的诗美特质为初唐诗张目。在《编初唐诗叙》中,他对初唐诗作出极高评价,并将大历以后诗作为其对立立面以显出高下:“初唐诗如池塘春草,又如未放之花,含蓄浑厚,生意勃勃。大历以后锄而治之矣”^①。在《与康对山论诗书》中,他再次重申揄扬初唐诗的观点:

以为古诗汉魏尚矣,其五七言近体及歌行排律之类篇章,汗牛靡下百氏,循其正轨,造入堂室,皆莫过于初唐,故沈宋燕许,高入云霄,即杜为劣,诚古今射雕之手。仆尝有言:“初唐诗如池塘春草,又如未放之花,含蓄浑厚,生意勃勃,大历以后,锄而治之矣。”始在南都为此论,人皆嗤之为妄,惟汝南孟望之、关中李子西、常州唐应德、闽南王道思、湖广王汝化稍以鹏言为然。有问者曰:“初唐不如盛唐,古今定论,子何以优劣之也?”鹏曰:“南金拱壁,何容易谈。然初唐如春园草木杂生,但少经理而元气却厚,盛唐则淘洗锄治,□□□□,条理可观,生意稍薄矣。”^②

樊鹏标举初唐,似乎与前七子近体宗盛唐的理念相抵牾,但仔细阅读这段话,可以发现,他并未否定盛唐诗的价值,亦并未摒弃规模盛唐的学诗方法。他不同意在“诗必盛唐”观念长期影响下文坛上“初唐不如盛唐”的“古今定论”。他前后两次提到“生意”,而“池塘春草”“未放之花”“春园草木丛生”这些比喻其实就是“生意”的形象化表达。可见,“生意”其实就是一种新鲜活泼、自然天成的生命意趣。他以“生意”为审美标准,自然更青睐于格律初立、具有蓬勃郁发的创造力和生命力的初唐诗。

樊鹏虽标举初唐诗,但他并没有把初唐所有诗歌都视作学习对象,他推崇的是狭义的初唐诗——初唐的近体格律诗。在《编初唐诗叙》里,他明确交代了《初唐诗》^③的选诗范围——“专取贞观至开元间诗”“而古诗不与焉”。^④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关于“古诗不与”的问题。樊鹏古体以汉魏为尚,他虽推崇初唐诗,却也心知初唐古诗较之汉魏古诗实有差距,于是只收录初唐的近体诗。其二,他所指称的“初唐”的范畴是“贞观至开元”,这表明他认为这一时期的诗作最符合他对“生意”“元气浑厚”的理想。

前七子中的何景明后期在杨慎等人的影响下把目光转向汉魏初唐,虽没有发生彻底的转变,但已开樊鹏等人转向初唐之端倪。就像他的老师一样,樊鹏最开始也是孜孜于盛唐乃至孜孜于老杜的。他作为在前七子羽翼下成长起来的文人,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由“诗必盛唐”到学为初唐的转向过程。这一转向在樊鹏写给康海的《与康对山论诗书》中有明确的表述:“近集拙作六卷,中都以后,大抵学步初唐。”^⑤樊鹏嘉靖十一年、十二年督储濠梁,这是他《中都集》所创作的时间。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樊鹏是在嘉靖十一年、十二年正式转向学习初唐的。上引戴冠“以杜陵家法,而兼之以晋宋风度”之语正说明樊鹏至少在嘉靖八年以前仍是学杜的。

樊鹏作为前七子羽翼,在复古阵营内部转向初唐,其中包含着很多原因,如个人对“含蓄浑厚”特

① 樊鹏.樊氏集[M].明嘉靖十三年孔天胤刻本.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② 樊鹏.樊氏集[M].明嘉靖十三年孔天胤刻本.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③ 樊鹏在嘉靖十二年左右编选了3卷《初唐诗》,此书原有序,分上、中、下3卷,专选初唐人诗,在《编初唐诗叙》中对选诗范围和选诗宗旨有明确说明,南京图书馆藏有明刻本《初唐诗》3卷。

④ 樊鹏.樊氏集[M].明嘉靖十三年孔天胤刻本.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⑤ 樊鹏.樊氏集[M].明嘉靖十三年孔天胤刻本.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质的追求,对拟杜风气的不满,与唐顺之的交游,何景明的影响等,这些都促使他最终转向对初唐诗的学习。

与前七子复古焦点上的差异是其后期转向初唐诗的内在动因。前七子诗歌复古的目标在于恢复诗歌的本体特征,而樊鹏虽然继承了前七子的复古观,但他的着眼点不仅在于诗歌本身的特质,或者说,他虽然也关注诗歌形式风格上的东西,但他最终要通过对诗歌社会价值的体认以提高诗歌的地位。事实上,他复古的焦点有二:一是文章表达情感的模式以及由此体现出的风格。他主张诗人应合乎统治秩序的道德伦理情感涵泳于诗篇,并且情感的表达要含而不露,实现诗教之目的;二是追求有“生意”之作。在他看来,盛唐诗固然成就卓著,却不如初唐诗新鲜活泼。基于这两个焦点,他提出了复古的审美标准,即“含蓄浑厚”“生意勃勃”。在此审美理想下,他便不像前七子那样重视文章格调法式,前七子关于“文有法式”的论述有很多,而樊鹏的书序里对“法”却只字不提。一方面是受何景明“舍筏登岸”说的影响,并且由于他对李梦阳“刻意古范,铸形宿模,而独守尺寸”^①的做法感到不满,因此干脆不提“法”;另一方面则是樊鹏复古的焦点不在于前代文章诗歌之体式,因此本身就并不重视所谓“规矩”,更不主张字摹句拟古人之作。

嘉靖前期诗坛思潮之迁革与师友之濡染则对其转向起了关键作用。前七子执着于体式法度之效拟,使得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拟古不化”的困境。值此之际,诗坛诸流派竞相立说以矫其弊,初唐派即其中之一。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所载:“明三百年诗凡屡变,……弘、正间,三变而为盛唐,嘉靖初,八才子四变而为初唐,皇甫兄弟五变而为中唐,至七才子已六变矣。”^②朱氏之语正指出嘉靖年间文坛流派之纷繁复杂以及初唐派之兴起。初唐诗派由当时一群新进进士所倡导,如王慎中、王格等于嘉靖五年及第,与樊鹏为同榜进士;稍于其后而进一步扩大初唐诗派影响的唐顺之自嘉靖八年得中进士后,就与陈束等同年开始“共倡为初唐六朝之作,以矫李、何之习”。^③樊鹏与倡导初唐诗的李宗枢、唐顺之二人于嘉靖十一年会于濠梁,而其正是在居濠梁的这一时期发生了“学步初唐”的转向,可见唐、李二人对樊鹏彻底转向初唐产生了一定影响。^④樊鹏在《编初唐诗叙》中所载“予嘉靖癸巳督储濠梁,得关中李子西相与评古今诗。李固豪杰士,识鉴精敏,动以初唐为称,适与予契”^⑤便提及在濠梁与同道李宗枢谈论初唐诗之事,可见其诗学转向与诗友互动交往、诗艺谈道也有关系。

樊鹏和唐顺之等人标举初唐皆源于其对彼时诗坛主流拟杜而导致诗坛渐趋僵化的不满,希冀通过新的复古方向来求新求变。初唐诗派不反对弘、正年间前七子所倡导的复古运动,像王慎中、唐顺之、李宗枢等本就是学习前七子复古理念的,他们所不满的只是拟杜风气的流衍给诗坛造成的板滞。樊鹏以何景明弟子、前七子羽翼的身份参与到倡导初唐诗的阵营当中,当然也不是为了反对前七子的复古运动,而是为匡正复古派后学拟杜之弊。胡应麟《诗数》中的一段话可与此相证:

自北地宗师老杜,信阳和之,海岱名流,驰赴云合。而诸公质力,高下强弱不齐,或强才以就格,或困格而附才。故弘、正自二三名世外,五七言律,往往剽袭陈言,规模变调,粗疏涩拗,殊寡成章。嘉靖诸子见谓不情,改创初唐,斐然溢目,而矜持太甚,雕绩满前,气象既殊,风神咸乏。既复自相厌弃,变而大历,又变而元和,风会所趋,建安、开、宝之调,不绝如线。王、李再兴,扩而大之,一时诸子,天才竞爽,近体之工,欲无前古,盛矣。^⑥

① 何景明. 与李空同论诗书 [A]. 何景明. 何大复集 [M]. 李淑毅,点校.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575.

② 朱彝尊. 静志居诗话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636.

③ 永谿,等. 四库全书总目 [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④ 唐、李、樊三人于嘉靖十一年会于濠梁,并互相唱和,李宗枢《李石疊集》卷一《濠梁三遇行》序载:“壬辰之秋,八月既望,余以公游遇樊子少南、唐子应德于濠,欣其弗偶,乃赋三遇之章”。参见:李宗枢. 李石疊集 [A]. 明代诗文集珍本丛刊: 054 册 [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

⑤ 樊鹏. 樊氏集 [M]. 明嘉靖十三年孔天胤刻本. 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⑥ 胡应麟. 诗数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351.

胡应麟认为,初唐诗派所不满的是复古派后学在五、七言律创作上对杜诗的字摹句拟,而使其诗呈现出“粗疏涩拗”的“变调”特征。樊鹏批评那些“孜孜于杜”而“失之于粗”的“近日名家”,与胡应麟这段话中所描述的初唐诗派倡初唐诗的心理动因是相吻合的。

其实,樊鹏之转向初唐诗还可以从何景明的诗论里看到其渊源。由这个角度来看,樊鹏之标举初唐既是对前七子“诗必盛唐”说的变异,也是对何景明晚年重视六朝初唐这一观念的继承。何景明自言其学诗:“故景明学歌行、近体有取于二家(李、杜),旁及唐初、盛唐诸人,而古作必于汉魏求之。”^①这表明,他学近体、歌行虽以李杜为主,却也没有忽视初唐,且在这里他还是持宗杜的观念。而在《明月篇序》中他就明确指出杜诗之“调”反在初唐四杰之下:“子美之诗,博涉世故,出于夫妇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此其调反在四子之下与?”^②表明此时他对初唐诗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认可。樊鹏作为何景明门生,他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其老师的影响而对初唐诗给予关注,故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说“(樊鹏)论诗一以初唐为宗,亦原本于仲默也”^③,可谓的论。

(二) 由重视个人情感到重视道德情感

樊鹏在诗“本乎情”这一根本命题上与前七子保持共识,然而他对情感内涵的理解却不同于前七子。与前七子注重抒发个人情志相比,樊鹏更强调诗歌当涵泳以忠孝、节义等为内容的伦理化、道德化情感。其《吕泾野先生四言诗叙》颇能体现其对情感的看法:

后世惟汉苏子卿去匈奴诸作,忠孝根诸心,节义以鼓气,金声玉振,良然寡俦。唐惟杜子美知此义,故亦称冠绝。吁!观子卿子美可以知泾野先生矣!是故玄免冬日,昭孝子之则,采芹笃师友之德,取人星斗,述忠臣之节,于昭惟文,纪圣君之业。简辞以尽义,即近而指远,忠厚温雅,观德立教,于是乎在风雅遗音,盖有不容无者。^④

樊鹏认为,只有苏武“忠孝根诸心,节义以鼓气”的诗方能达到“金声玉振”的审美高度。可以看出,作为传统儒家士人,他还是未能免俗地以道德伦理作为情感之本,而道德情感作为一种共性情感,显然有别于李梦阳“情感于遭,故其言人人殊”^⑤的以客观环境为基础的个性化情感。

对情感个性与共性理解的不同,决定了樊鹏诗歌情感观念中的情感来源和艺术表现与前七子存在差异。就情感来源而言,前七子强调情感的自发性和本真性;而樊鹏则更注重情感的道德属性,将“忠孝节义”等伦理价值作为情感表达的前提和内容。在艺术表现上,前七子重视情感的自然流露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樊鹏则更关注情感表达是否符合儒家诗教规范。这样,就将前七子重视个人情感的进步文学思潮拉回到以道德情感为本的老路。樊鹏的这一抉择其实跟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前七子前期身处政治相对清明的弘治朝,他们具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昂扬奋发的精神状态,渴望在这一风云际会下实现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而樊鹏生活的正德、嘉靖年间,是明朝士人从充满希望到逐渐感到幻灭的时期,对内面临着政治腐败、党争激烈、宦官与内阁权力博弈加剧等忧患,对外又有北方鞑靼、东南倭寇等侵扰。生活在这样一个明争暗斗、人心隳坏的时代里,作为一个文人、儒者,他把对当时社会的担忧和对“郁郁乎文哉”的往古盛世的向往尽寓于其吟咏性情(咏性情之正)以实现“教不肃而成”的期待中。

由诗主情真的理论出发,樊鹏与前七子同样呼唤“风”诗传统的回归,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李梦阳在《诗集自序》中引王叔武言:“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骂而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谓风也”^⑥,主张恢复“风”诗传统;何景明《海叟集序》中言“景明仕宦时,尝与学士大夫论诗,谓三代前不可一日无诗,故其治美而不可尚;三代以后,言治者弗及诗,无异其靡有治

① 何景明. 海叟集序 [A]. 何景明. 何大复集 [M]. 李淑毅,点校.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595.

② 何景明. 何大复集 [M]. 李淑毅,点校.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211.

③ 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326.

④ 樊鹏. 樊氏集 [M]. 明嘉靖十三年孔天胤刻本. 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⑤ 李梦阳. 刻戴大理诗序 [A]. 李梦阳. 李梦阳集校笺 [M]. 郝润华,校笺. 北京:中华书局,2020:1699.

⑥ 李梦阳. 李梦阳集校笺 [M]. 郝润华,校笺. 北京:中华书局,2020:2051.

也”^①,也表现出对诗教传统的向往。李、何呼唤“风”诗传统和诗教传统的回归,着眼点在“风”诗之情真,李梦阳肯定王叔武“真诗乃在民间”^②之慨叹,认为由真人所发之真情可以实现诗教之鹄的。樊鹏同样把“风”诗置于崇高地位,却将“风”诗传统的阐释重心从情感本真性转向伦理规范性,也就是说他所关心的是诗歌在维护纲常伦理方面的治化作用,而淡化甚至忽略了“真情”。在其书序中关于“诗教”的论述一共出现了3次:

惟古闾里咸习歌咏,是以此教不肃而成。^③

教化之于人深矣,古者乡有庠,党有序,闾里有师,稚子咸能歌咏,教至备也。……故父兄之教不肃而成……^④

纪圣君之业,简辞以尽义,即近而指远,忠厚温雅,观德立教,于是乎在风雅遗音,盖有不容无者……^⑤

细读以上这些论述,可见其诗教观:第一,“观德立教”之观点体现了樊鹏对诗歌社会功能的定位,认为诗歌的教化具有“纪圣君之业”和“闾里歌咏”两种实现途径。第二,直接把诗歌与教化画等号,认为二者相辅相成,这就忽略了诗歌的艺术性而只重视其思想性和社会性,但又企图通过重视诗歌社会性而提高诗歌的地位。第三,认为在诗歌中实施诗教的具体策略是“简辞以尽义,即近而指远”,这显然是对儒家经典“辞约旨丰”表现传统和“引譬连类”思维传统的继承。

从这个角度来说,前七子倡导复古的目的之一就是使诗歌恢复性情之真,因之更注重从文学本体的层面来阐释诗文价值;而樊鹏则又退回到从社会作用层面阐释诗文价值的老路,虽然他同样主张以情为本,重视文道兼备,但以忠孝、节义等道德情感作为判断诗歌情感的标准,显现出其理论对传统儒家诗教观的回归,削弱了文学情感的真实性与独立性。

三、樊鹏在复古阵营中的地位与影响

以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等为代表的前七子在台阁体诗、性气诗笼罩诗坛之时崛起,在弘治、正德年间大放光彩,一时众多文人翕然相从。樊鹏继承何景明等前七子的复古理论,却又不满足于前七子的近体学盛唐而转向学习初唐诗,为复古诗坛贡献了一己之力。

樊鹏的诗学贡献首先体现在对前七子复古理论的修正和复古范围的突破。七子派以“诗必汉魏盛唐”为宗旨,将复古对象严格限定为汉魏古诗与盛唐近体,而樊鹏则在继承这一核心理念的同时,拓展了复古的视野和取径范畴。他主张古体宗汉魏、近体宗初唐,意在让人把眼光扩至盛唐以外的初唐,将复古的取法范围由盛唐上溯至初唐,以此来调节前七子机械模拟之弊,为复古派内部的复古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樊鹏摆脱“诗必盛唐”说的拘束,引而上之,学为初唐,胆识超越时人。赵时春《樊氏集序》中言:“吾尝忧夫盛衰之相因而嗣之者之弗广也,樊子乃能力起而任之,其源出于何大复氏,独坚壁立玄甲之帜,不袭其师说,灿然成一家,言视大历以还蔑如也。”^⑥赵氏之语正指出樊鹏不袭师说、自出机杼而成一家的创新品格。可惜的是,樊鹏在理论与创作上的新变仍只是停留在“学初唐而得初唐,学汉魏而得汉魏”^⑦的拟古层面,而未领悟到要摆脱拟古困境,实现精神上的突破,关键在于展现时代风格,即须表达特定时代下个人所发出的真实的声音。所以樊鹏对前七子诗学理念上的这一变异仍属于复古阵营内部的变异和修正。

① 何景明. 何大复集 [M]. 李淑毅,点校.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594.

② 李梦阳. 诗集自序 [A]. 李梦阳. 李梦阳集校笺 [M]. 郝润华,校笺. 北京:中华书局,2020:2051.

③ 樊鹏. 编初唐诗叙 [A]. 樊鹏. 樊氏集 [M]. 明嘉靖十三年孔天胤刻本. 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④ 樊鹏. 巩昌崇义书院记 [A]. 樊鹏. 樊氏集 [M]. 明嘉靖十三年孔天胤刻本. 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⑤ 樊鹏. 吕泾野先生四言诗叙 [A]. 樊鹏. 樊氏集 [M]. 明嘉靖十三年孔天胤刻本. 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⑥ 樊鹏. 樊氏集 [M]. 明嘉靖十三年孔天胤刻本. 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卷首序.

⑦ 康海. 樊子少南诗集序 [A]. 樊鹏. 樊氏集 [M]. 明嘉靖十三年孔天胤刻本. 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卷首序.

此外,樊鹏是嘉靖初年初唐诗派里具有理论自觉的人物之一,通过对初唐诗美学特质的阐述、诗选和创作的实践以扩大初唐诗的影响。他在文章里反复为初唐诗张目,还身体力行地编选《初唐诗》3卷,以选本形式确立初唐诗的典范地位,同时亦为后学者提供可资借鉴之范本。樊鹏对初唐诗诗美特质的把握以及对初唐诗的倡导,在当时已成为部分人的共识,因此也得到了不少文人的支持。如为樊鹏编刻诗集的孔天胤,和樊鹏“语相契”,其在《刻樊氏集叙》中评价初唐诸君“乘运跃鳞,回风涣藻,则约彼靡谐,俾就律格,淫纤始删,声音肇兴,若拾遗寻源,燕许导流,一时响著风雅攸敦,故其蓄意命言,蕴精表灵渊然苍然莫可究量”,其所谓的“原其始”^①与樊鹏称许初唐诗的视角是一致的。^②康海在《樊子少南诗集序》中也称赞初唐诗“其词虽缙而其气雄浑朴略,有国风之遗响”“正以其承六朝之后而能卒然振奋其气词,或稍因其故而格则力脱其靡也”。^③王格在《初唐诗叙》中言:“樊子推言之也,曰‘如池塘春草’,又曰‘如未放之花’,斯不易之论矣。非笃好苦学,心知其意,何足以语此?”^④把樊鹏对初唐诗美学特质的论断作为“不易之论”。孔天胤、康海、王格的这些论述与樊鹏同声相应,是对樊鹏诗论的进一步阐发。在樊鹏的呼吁和理论倡导下,初唐诗的影响和价值地位都得到相当程度的扩张。

樊鹏标举初唐诗是基于他对复古派及其后学“偏狭”与“摹拟”弊病的关注与反思,主张学古者把目光放至盛唐以外的初唐,扩张了诗学范围。其虽仍未摆脱“偏狭”之弊,但借规模初唐诗而在复古主义阵营内部作出修正的努力值得称许。要之,作为羽翼人物,樊鹏的转向并不是对前七子复古理念的悖逆,而是对前七子复古理念的微调与完善,确保了复古运动的良性发展。

On Fan Peng's Inheritance and Variation of the Poetic Theories of the Former Seven Scholars

SHI Xiaojun, ZHANG Peili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510632)

Abstract: The Former Seven Scholars, led by Li mengyang and He jingming, emerged in the Ming Dynasty during the Hongzhi and Zhengde periods. They vigorously advocated retro, which formed a far-reaching retro trend in an impressive display of power or influence at that time. Fan Peng learned from He jingming, inherited the retro theory of the Former Seven Scholar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ought about and corrected the abuses presented by the Former Seven Scholars i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creative practice, thus creating a new dimension in the process of inheritance. He inherited the retro consciousness of the Former Seven Scholars, but aiming at their narrowness, expanded the objects of imitation from the High Tang to the Early Tang. He followed their awareness of distinguishing poetic genres and emphasized true feelings in poetry, but attached more importance to the social function of poetry, stressing poetic education and advocating “literature as a vehicle for morality”. Influenced by the Former Seven Scholars in his early years, he held the consciousness of “revering Du Fu”, while in his later years, inspired by He jingming, he proposed the theory of “variant styles” in Du Fu's poems.

Key words: Fan Peng; the Former Seven Scholars; poetic thoughts; inheritance and variation

(责任编辑:杨云红)

① 樊鹏. 樊氏集 [M]. 明嘉靖十三年孔天胤刻本. 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卷首序.

② 樊鹏. 樊氏集 [M]. 明嘉靖十三年孔天胤刻本. 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卷首序.

③ 樊鹏. 樊氏集 [M]. 明嘉靖十三年孔天胤刻本. 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卷首序.

④ 王格. 初唐诗叙 [A]. 黄宗羲. 明文海 [M]. 北京:中华书局,1987:2312.